

魏晋风度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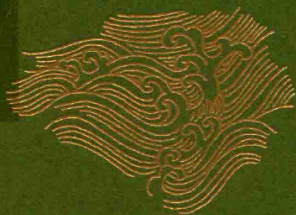
上

鲁迅／撰

吴中杰／导读

蓬莱阁典藏系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魏晋风度及其他

上

鲁迅／撰

吴中杰／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蓬莱阁典藏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风度及其他 / 鲁迅撰; 吴中杰导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5

(蓬莱阁典藏系列)

ISBN 978-7-5325-8894-7

I. ①魏… II. ①鲁… ②吴… III. ①鲁迅著作—选集 IV. ①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3930 号

蓬莱阁典藏系列

魏晋风度及其他(全二册)

鲁迅 撰 吴中杰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市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地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21.625

插 页 10

字 数 436,000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894-7/K · 2504

定 价 7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晚清民国,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旧传统与新思想无时不在激荡中融汇,学术也因而别开生面。士人的眼界既开,学殖又厚,遂有一批大师级学者与经典性著作涌现。这批大师级学者在大变局中深刻反思,跳出旧传统的窠臼,拥抱新思想的精粹,故其成就者大。本社以此时期的大师级学者经典性著作具有开创性,遂延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撰写导读,希冀借助今之专家,诠释昔之大师,以引导读者理解其学术源流、文化背景等。是以本社编有“蓬莱阁丛书”,其意以为汉人将皮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后世遂称藏书阁为“蓬莱阁”,因借

取而为丛书名。“蓬莱阁丛书”推出后风行海内,为无数学子涉猎学术提供了阶梯。今推出“蓬莱阁典藏系列”,萃取“蓬莱阁丛书”之精华,希望大师的经典之作与专家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继续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与大师的治学风范。

《魏晋风度及其他》导读

吴中杰

说起鲁迅的学术著作，学者们一致认同的是《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此外还有一些考证文字，至多再加上几篇学术演讲。至于那些以杂文笔调写作的文章，虽然亦有涉及重要的学术问题，包含着深刻的理论见解，但往往却被排除在学术领域之外。

这是一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形式主义见解。

其实，一篇文章有无学术价值，并不在于它的表述方式是否符合学术规范，有无学术文章的形式，而要看它是否真有学术内容。有些专题著作、许多高头讲章，虽然写得相当规范，学术文章形式上该有的东西，一样不少，却是独缺创见，只不过人云亦云，以拼凑、复制为能事，这种著作不能给学术增添任何东西，其实并无学术性可言。另一种文章，在形式上超越规范，看似任意而谈，却是有感而发，表面上看来，不像学术文章，其实却提出了重要见解，在理论上自有建树，对学术能起推动作

用。鲁迅的许多杂文,就属于后一类。

鲁迅的杂文,都是具有现实的针对性的。他所面对的,有属于政治问题,有属于社会问题,亦有属于文化思想方面的问题。即使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鲁迅也总是将它和文化思想问题联系起来看,探寻其历史根源,所以,鲁迅的许多杂文都包含有学术理论见解,也可以算是学术随笔。而且正因为其有现实的针对性,所以对学术发展所起的作用更大。鲁迅与学院派文人学者不同,他无意于追求理论的系统性,也不想创造什么学术体系,他所关心的是现实斗争,只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对现实的学术文艺起推动作用。正如他在《华盖集·题记》中所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体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这里虽然说的是短评与创作的关系,由此也可见他在学术上的态度。

鲁迅既然以战士的姿态现身于文坛学界,他当然对旧的文化思想有所批判,同时也必然要提出自己新的见解。何况他又并非一般的战士,而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旗手,因此,他的学术主张和理论观点在现实中必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忽视这种影响,就无法说明中国现代文艺和学术的发展历史。

基于此种见解,当上海古籍出版社约我为他们的《蓬莱阁丛书》编选一本除《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两部分,另出一书)之外的鲁迅学术文集时,我就将他那些虽无学术文章的形式,而实则有着深刻的理论见解,而且在现实中也的确起过重要作用的杂文、序跋和译文附记等等,也都编选进去,——虽然由于篇幅的关系,仍删落了不少。我以为这些文章,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上,实在要比那些空泛的专著和讲章来得重要。

本书的书名,读者一望而知,取自鲁迅的名文,全书按照所论问题,分为五个部分:旧文明批判;文化史研究;新文艺概观;翻译文学论;语文改革说。各类文章则以写作或发表的日期为序,加以排列。但因鲁迅的文章并非专论,所以颇难严格分类。而且,他是主张撰写科学论文时,“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①的;并认为:“‘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②所以他在谈文化史时,每不忘批判旧文明,而叙往事的目的,也总是为了针砭现实。因此,这里的分类,只能是相对的了。

但为了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鲁迅文章的现实针对性,我在这篇导读中,仍将循着文集中所分的五个部分,对这些观点提出的历史背景,略作介绍。

鲁迅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他自述创作小说的目的是为人生,而且要

改良这人生；而他之所以要写杂文和评论，则是为了进行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因此，对旧文明、旧社会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和评述，是他写作的首要任务。

还在1907—1908年间，他在日本留学时所写的《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等文，就开始了对中国的旧文明进行批判，对国人之妄自尊大、抱残守缺，深表忧虑。到得“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这种批判的火力就更加猛烈。比如，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长篇论文《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随感录》中若干篇章，就是针对中国传统的夫权思想和父权思想而发的，而这两种思想，在中国封建伦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三纲五常中的两个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值得引起重视。那么，三纲中的第一个纲：君为臣纲，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君权思想，为什么倒不作专文来加以批判呢？这与鲁迅批判工作的现实针对性有关。盖因当时帝制已经推翻，共和国宣告成立，虽然有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事件，但都以闹剧形式告终，这说明，帝制之在中国，已被抛弃，君权思想很不得人心。尽管有人还在讲什么虚君共和，也有人提出驳斥，但显然已非人们关注的热点，所以鲁迅不在这方面多花笔墨，而将批判的锋芒对准夫权思想和父权思想，因为这两种思想在人们的意识中还根深蒂固，非要痛加批驳不可。

正因为鲁迅的文明批评是与社会批评联系在一起的，有很强的现实性，所以他批评的着重点不在于旧人物的本身和旧学说的原旨，而是这些人物的历史命运和这种学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即使对于

新文化运动中重点批判的孔子及儒家学说，鲁迅也没有正面批判的文章，他后来所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虽然点出了孔夫子的大名，而着重所说的，乃是孔夫子在死后一直被当作敲门砖来使用的历史命运，以及现代中国三位统治者使用这块敲门砖，却敲不开幸福之门的喜剧性结局。孔夫子之所以会在死后受到历代帝王的追捧，作为敲门砖来使用，当然与他本身的学说有关，——他曾经为权势者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而鲁迅所关注的不在于这些治国方法的本身，而是它的治绩。《春末闲谈》所揭露的是封建等级制度所造成的人民精神的麻木状况；《论“他妈的！”》批判的是封建门阀制度；而《灯下漫笔》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鲁迅有时还运用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进一步分析有些理论提出的现实原因和提倡者的潜在用心。有一篇为幽默杂志《论语》而写的，自称为“‘学匪’派考古学”的文章：《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就从中国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对中庸学说作了深刻的剖析。鲁迅说：“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而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

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本文的重点虽然在于文末对于当局的讽刺，但其中对于中庸学说的剖析，不能不说是精辟异常，入骨三分。这种分析方法推而广之，用来分析某些社会现象，也容易看出问题的底蕴。比如《隔膜》一文，就通过《清代文字狱档》的材料，指出某些文字狱的形成，其实并非因为笑骂了清朝，而只是为了“隔膜”。满洲人是严分主奴等级的，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还下“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在历史上，这样的胡涂人实在很多，犯事者胡涂，旁观者也胡涂，鲁迅的分析，可使读者的眼光锐利起来。

鲁迅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文化思想上的斗争十分激烈。作为革新派，他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必然有所批判。但鲁迅很少从学理上正面与之论辩，大抵采取釜底抽薪之法，凭借自己坚实的旧学根柢，指出这些为旧学辩护者本身就不通旧学，从而否定了他们提倡旧学的资格。最有名的是《估〈学衡〉》一文。《学衡》杂志是南京东南大学教授们所办，旨在反对新文化，而提倡旧学问，但其中骨干大都是些外国留学生，于旧学并无门径，于是弄得错误百出。本文撷拾了《学衡》杂志中一些

不通的文言文句，加以剖析，得出的结论是：“总之，诸公掎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愧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近年来，颇有些肯定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似乎当年新文化战士们对该派的批判倒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却始终无法将鲁迅指出的这些不通的文句说通，因而也无法推翻鲁迅说这个杂志是“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的结论。

鲁迅这种战法，同样施之于别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比如，章士钊在1923年，曾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极言文言文之优于白话文，他举例说：“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日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然而这个例子恰恰搞错了。鲁迅指出，该典出自《晏子春秋》，说的是晏子设计，用两个桃子使三个勇士自杀而死。所以，这里的“士”，其实是“勇士”，而非“文士”。解作“读书人”，显然是错误的，这说明引用者于旧学欠通，而对白话文的攻击就显得缺乏根据。^③到得1934年，在新的一轮复古运动的背景下，汪懋祖老调重弹，鼓吹文言的优越，攻击白话之累赘。他举例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但这也是一知半解的说法，鲁迅指出，这五个字，至少还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可见“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

也比较的含糊”。他“就用主张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举的文言的例子，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④

此外，对于市面上流行的所谓“国学”和自称为“国学家”者，鲁迅大抵也采取这种揭露法。《“以震其艰深”》《所谓“国学”》《“一是之学说”》等文，即是为此而作。但是，鲁迅反对的是自我炒作的假“国学”和冒牌的所谓“国学家”，而对于扎扎实实做出成绩来的真“国学家”，鲁迅还是怀有相当的敬意的，对他们所从事的真“国学”，也是予以肯定的。且不说他对自己的老师——国学大师章太炎，始终执弟子礼甚恭，并接受了他的许多学术观点，而且对于民国以来还拖着辫子不肯剪掉的清废帝的“南书房行走”王国维的研究成果，也给予充分的肯定。就在他批判假“国学”和假“国学家”的同时，作为对比，还特别提出了王国维，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⑤刘师培是出卖革命的变节分子，鲁迅很不耻他的为人，对于他的以提倡“国粹”来反对新文化运动，鲁迅曾加以痛击。在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的信中，鲁迅以极其尖锐的口吻说：“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编丛刊，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但是，刘师培毕竟是有学问的人，鲁迅对于他本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还是肯定的。后来，鲁迅在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

学术演讲时，还特地向听众介绍刘师培的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并说：“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可见鲁迅对刘师培学术成果的重视。显然，他所反对的是以“国粹”来反对新文化，而非国学研究本身。

鲁迅之所以要提倡新文化，而批判旧文明，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在鲁迅看来，人类的文明有如长江大河，是不断地前进的，如果一个民族要固步自封，抱残守缺，难免就要落后于别的国家民族，因此也难以生存。鲁迅所担心的是，我们太强调自己特别之处，死抱住“国粹”不放，缺乏相当的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在当今的世界上就站不住脚，难以与世界各国协同生长，争一地位，“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⑥鲁迅与国粹主义者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国粹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固有文明是国之精粹所在，必须保存，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保存固有文明；而鲁迅则从现实的生存需要出发，认为“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他之反对保存国粹，就是由于国粹把中国搞得一团糟的缘故。他列举中国历史上的暴虐与混乱，说明国粹并不能救中国：“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

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⑦所以，他得出结论，非要进行文化改革不可。

正是从文化革新主义出发，鲁迅提出了反对读古书的主张。最明显的是 1925 年的《青年必读书》中所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文一出，即遭到强烈的反对，有的甚至骂他是想卖国。其次是 1933 年关于《庄子》与《文选》之争。因鲁迅反对向青年推荐《庄子》与《文选》，至今还受到非难。其实，鲁迅的这些话都是有针对性的，在发表《青年必读书》之后不久，他在致徐旭生的《通讯》中就说过：“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仍中了‘老法子’的计。”所以，学者们在报纸上向青年推荐必读书目，也大抵都是古书。鲁迅的言论，即是对此而发。1933 年，也正是新的复古思潮掀起之时，他看到当时的新青年，“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来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想起光绪末年那些“老新党”们讲维新，学西学的情景，对比之下，不禁感慨系之，于是乃有《重三感旧》之作。从文中所提到的每一件事看，都不是什么大事，作为个人爱好，也无可非议，但是，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看，却反映出一种倾向性的问题来了。鲁迅此文，显然是对当时复古思潮的批评，并非针对某个个人而发，后来引起《庄子》与《文选》之争，而且双方都涉及个人，则并非鲁迅之初意也。

因为鲁迅劝人“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遂被人指责为民族虚无主义者，其实，鲁迅对于中国古籍，也并非一概否定，问题是读些什么，以及如何读法。他以为要拿一二千年以前所写的儒家经典来指导现实运动，是荒谬的，所以他反对读经，更反对“读经救国”论，但他却提倡读史，因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而且特别提倡读野史杂记，“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可更容易了然”。^⑧——他的出发点，还是为了现在。

还在从事文化工作之初，鲁迅就提出这样的设想：“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⑨后来，他在评论陶元庆的绘画艺术时，又说：“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儼尺或清朝的营造尺，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⑩可见鲁迅批判旧文明的目的，并不是要全盘西化，而是要创造一种既不落后于世界潮流，又弗失中国固有血脉的新文明。这就是鲁迅号召青年们去创造的“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⑪！

二

其实，鲁迅自己对于“国学”倒是很在行的。他既有家学渊源，又师

从过国学大师章太炎,后来还下过很深的功夫。而且,无论是古籍的整理,还是文化史的研究,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鲁迅承继了朴学传统,治学非常谨严,做了许多基础工作,特别在辑佚、校勘、考证方面,都有重要的成果。如:对乡邦文献的搜集,有《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对小说资料的辑录,有《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对古人文集的校勘,有《岭表录异》、《嵇康集》等;此外,还有一些关于逸文、墓志、碑铭的考证文字。他还收集过汉画像砖和碑刻的拓片,编了目录,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生前未曾出版。他晚年还与郑振铎合作,选印了《北平笺谱》,翻印了《十竹斋笺谱》。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史料。

但是,在鲁迅看来,文化史料的整理,只是为阅读和鉴赏提供了资料,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还不能代替文化史研究本身。要进行研究,除了占有资料之外,还需具有史识。鲁迅是既反对以资料的罗列来代替研究,也反对靠孤本秘籍作为惊人之具的。他曾批评郑振铎的著作云:“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⑫可见其对于“史识”的重视。

正因为重视史识,同时也就要求有深切的史论。虽然鲁迅自己的考证功夫很深,但是对于那种烦琐的考证,他是颇为反感的,而对于人们所称颂的以考据学见长的清代学术,也持有不同的看法。这在《算帐》一文中有所分析,同时,在1934年4月9日致姚克信中又说道:“清